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

吴宏岐 著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 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

吴宏岐 著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9YJA770021）结题研究成果
■ 本书出版受2013年广东省学科建设专项资金（暨南大学中国史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长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吴宏岐著.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492-2585-9

I. ①明… II. ①吴… III. ①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生态环境—研究—明清时代 IV. ①F299.29②X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8728 号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

吴宏岐 著

责任编辑:贾茜

装帧设计:蔡丹

出版发行:长江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邮 编:430010

E-mail:cjpub@vip.sina.com

电 话:(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87mm×1092mm 1/16

29.25 印张

678 千字

版 次: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92-2585-9

定 价: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互动研究1368—1911》（项目批准号09YJA770021）的结题研究成果。作者系统论述了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明清珠江三角洲市镇发展与城镇体系演变、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城外街区扩展与城镇形态演变、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内部空间结构演变、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所引起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造等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演变的互动特点与规律。

本书属于珠江三角洲历史城镇地理研究领域的专题研究，采用多重视角的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在断代区域城镇地理的研究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上均有所创新，可供历史地理学、城市史、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学、城市环境学等相关专业师生和文史爱好者阅读参考，同时也可供相关区域进行新一轮城镇规划与城镇建设时参考借鉴。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1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14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6
第二章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	23
第一节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的自然地理基础	23
第二节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的人文地理基础	29
第三节 内河河道的作用:以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水道为中心	34
第四节 从新会到澳门:清代西江水路交通的发展	66
第五节 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以顺德县龙江、龙山两镇为例	75
第六节 特殊因素的影响:华侨投资与广州、江门城市发展	87
第三章 明清珠江三角洲市镇发展与城镇体系演变	121
第一节 市镇发展与城镇体系的完善	121
第二节 珠江三角洲中部地区县域城镇体系的发展(I):顺德	136
第三节 珠江三角洲中部地区县域城镇体系的发展(II):三水	155
第四节 珠江三角洲东部地区县域城镇体系的发展:东莞	173
第五节 珠江三角洲西部地区县域城镇体系的发展:香山	180
第六节 珠江三角洲北部地区县域城镇体系的发展:增城	193
第四章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城外街区扩展与城镇形态演变	207
第一节 东莞县城外街区的扩展及其影响因素	208
第二节 三水县城外部形态特征与城外街区兴衰	219
第三节 一府两地:惠州城市外部形态的形成与演变	244
第五章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	265
第一节 明清肇庆府城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	266
第二节 明清惠州府城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	295

第三节	明清顺德县城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	318
第四节	明清东莞县城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	334
第五节	明清香山县城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	350
第六节	明清佛山镇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	375
第六章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所引起的区域生态环境问题	391
第一节	城镇发展所引起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	391
第二节	城镇发展所引起的区域人文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	402
第七章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造	423
第一节	城镇水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423
第二节	园林营建与公共环境维护	428
第三节	人文社会生态环境的改善	444
第八章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与区域生态环境演变的互动特点与规律	453
第一节	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的基本特点	453
第二节	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演变的影响	458
后记		46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相关学术研究综述

一、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已引起人们普遍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除了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商务印书馆,1996 年)、马正林《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李孝聪《历史城市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 年)等通论性质的论著以外,断代历史城市地理尤其是明清历史城市地理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不少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如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年),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燕山出版社,2000 年),侯仁之《北平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年),王剑英《明中都》(中华书局,1992 年),丁海斌、时义《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史红帅《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 年),刘景纯《城镇景观与文化: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文化的地理学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朱永杰《清代驻防城时空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年),等等;近三十多年来明清区域市镇史研究一直是学术热点,相关成果较为丰富,代表性论著主要有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年),苏则民《南京城市规划史稿:古代篇·近代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年),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年),姚亦锋《南京城市地理变迁及现代景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 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 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 年),梁泰森《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李伯重《江南的城市工业与地方文化(960—1850)》(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 年),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年),范毅军《传统市镇与区域发展:明清太湖以东地区为例,1551—1861》(台北:联经出版,2005 年),唐次妹《清代台湾城镇研究》(九州出版

社,2008年),罗婧《江南市镇网络与交往力——以盛泽经济、社会变迁为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邹振环、黄敬斌《明清以来江南城市与发展与文化交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刘凤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凤云《北京与江户: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徐弘《明清福建城市研究》(台北:“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1995年),侯宣杰《清代广西城市发展研究》(巴蜀书社,2011年),唐力行《明清以来苏州城市社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等等;近代城市史、市镇史与口岸史的研究成果也涉及清后期的城镇研究方面,如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茅家琦《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1840—1949年)》(科学出版社,2004年),何一民主编《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1997年),罗树伟《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志强、杨学义《近代辽宁城市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蔡云辉《战争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黄滨《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周子峰《近代厦门城市发展史研究,1900—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陈炜《近代广西城镇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8年),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王尔敏《五口通商变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瞿俊《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王敏、魏兵兵、江文君等《近代上海城市公共空间(1843—1949)》(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研究(1840—194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郭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2005年),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于海漪《南通近代城市建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樊如森《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梁博《逼迫下的回应——近代中国城市化与早期现代化研究(1840—1927)》(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等等;国外学者的一些论著也涉及明清城镇与市场研究方面,如(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中译本,2000年),(美)林达·约翰逊《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2005年),(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江苏人民出版社中译本,2006年),(日)斯波义信《中国都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译本,2013年),(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鎮社會史研究——空間と社會形成の歴史學》(汲古書院,1999年),等等。

近年来,国内外历史城市地理和城市史研究都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比较重视理论与方法创新,提倡多重视角的学科交叉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开始加强历史时期城市形

态、城市空间结构尤其是区域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互动研究,如李久昌《国家、空间与社会——古代洛阳都城空间演变研究》(三秦出版社,2007年),李瑞《唐宋都城空间形态研究》(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年),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李军《近代武汉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1861—1949年》(长江出版社,2005年),王茂生《从盛京到沈阳——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李炎《南阳古城演变与清“梅花城”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刘剀《晚清汉口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傅媚《近代岳阳城市转型和空间转型研究(1899—1949)》(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鲁西奇《城墙内外:古代汉水流域城市的形态与空间结构》(中华书局,2011年),张鹏《都市形态的历史根基——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发展与都市变迁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张杰《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王笛《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吴庆洲《中国古代城市防洪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年),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城市与水利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万谦《江陵城池与荆州城市御灾防卫体系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8年),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增刊)》,1999年),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发中心编《统万城遗址综合研究》(三秦出版社,2004年),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程民生《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艾冲《西北城市发展与环境演变研究——立足于陕西榆林地区的考察》(西安地图出版社,2004年)、童乔慧《澳门城市环境与文脉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徐卫民《秦汉都城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妹尾達彦編集《都市と環境の歴史學》第2集《特集 國際シソポヅウム東アヅアの都市史と環境史—新しい世界へ》(株式会社理想社,2009年)和第4集《特集 國際シソポヅウム都市と環境の歴史學:五年間の成果》(株式会社理想社,2009年),等等。有些历史城市地理、中国市镇史学者还从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任放《中国市镇历史研究与方法》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些农业史的学者,近年也开始关注区域历史时期农业发展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中心展开了研究工作,如吴建新《明清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吴建新《民国广东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等。这些研究成果的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值得充分参考和借鉴。

二、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地理研究评述

珠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城镇发达地区之一,明清时期是其城镇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发展具有自身的

特点,研究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地理不仅有助于促进区域历史城镇地理的深入开展,而且对于促进现代城镇规划和城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近三十多年来,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研究的相关领域先后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是区域地理条件及其对城镇发展影响研究,其二是市镇类型与城镇体系研究,其三是城镇形态与城镇空间结构研究方面。现分类略作评述。

1. 区域地理条件及其对城镇发展影响研究

城镇地理研究要以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为基础,因为这个基础或影响了城镇的选址与分布,或对城镇的发展起着推进或延缓的作用,需要给予充分的关注。

珠江三角洲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与演变,素来是自然地理学、地貌学、第四纪研究与地质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问题。徐俊鸣编著的《珠江三角洲》一书对珠江三角洲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指出泥沙沉积与海水运动是重要的因素,并认为历史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不断向外扩展的同时,也存在地区上的差异,可分为西、北江三角洲北部台地围田区,西、北江三角洲中部沙田区,西、北江三角洲南部岛丘平原区,东江三角洲及滨海平原区等四个分区,相应地探讨了这几个分区在形成过程中对城镇具有重要的影响。^① 黄镇国等编的《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一书则是从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角度对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规律进行了研究。^② 中山大学地理系编的《珠江三角洲自然资源与演变过程》一书综合研究了珠江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包括河道演变、台风暴潮、河口的现代过程等,重点从水质与环境进行了研究。^③ 李平日、乔彭年、郑洪汉等编著的《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一书对珠江三角洲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海面升降和人类活动与环境演变的关系作了详尽的论述,还探讨了现代三角洲的演变趋势、未来海面变化对环境的可能影响等问题。^④ 王晓静、王建华、曹玲珑等的《广州地区晚第四纪孢粉气候研究》一文,利用广州地区南北两个不同沉积地貌区的钻孔进行孢粉分析,研究了以广州所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晚更新世以来的沉积环境和气候变化,孢粉分析结果显示:在晚更新世珠江三角洲地区气候经历了偏冷干—偏凉干—暖湿—热湿—偏凉干—冷干的变化过程;全新世气候明显转暖湿,整体上以暖湿为主。^⑤ 卢炜峰《珠江三角洲城市内河涌的演变及规划探析》一文简要研究了珠江三角洲城市内河涌的变化。^⑥ 徐俊鸣《广州市区的水陆变迁初探》一文对历史时期甘溪和东郊的水陆变迁、西关和西村一带的水陆变迁、城内渠道和城南河岸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广州水陆变迁的重要结论,指出珠江北岸陆地的扩展远较南岸为广;西北两江的泥沙主要沉于南海、顺德、中山等县境形成西北江三角洲,而东江的泥沙主要沉积于东莞、增城等县境形成东江三角洲,而广州溺谷湾适处

^①徐俊鸣:《珠江三角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

^②黄镇国:《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2年。

^③中山大学地理系:《珠江三角洲自然资源与演变过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④李平日、乔彭年、郑洪汉,等:《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

^⑤王晓静,王建华,曹玲珑,等:《广州地区晚第四纪孢粉气候研究》,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⑥卢炜峰:《珠江三角洲城市内河涌的演变及规划探析》,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于两个三角洲之间,所以还能够保持一定的深水道,有利于广州水运的发展;海潮对于这里淤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① 李俊敬《珠江广州河段江岸的变迁》一文对珠江广州河段江岸的变迁进行了论述。^② 薛建强《中山地区水文特性分析》一文针对中山地区的地形、地貌、天气、径流、输沙量、洪水、降雨、风暴潮和水质等方面,论述了该地区的水文特性,分析了各水文要素的变化趋势。^③ 宋书丽《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顺德部分成陆研究》一文从村落分布、水面变迁、桥梁修建、堤围修筑、沙田开发、蚝壳分布六个方面,对明清时期顺德成陆进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和考察,对于了解顺德城镇兴起与发展的自然地理背景有一定的帮助。^④

关于珠江三角洲的自然环境对城镇发展的影响,学界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如中山大学地理系编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环境与城市发展》主要研究了珠江三角洲的城市环境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问题。^⑤ 吴建新《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的水环境》一文则是研究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城镇的水环境的专题研究成果,认为“水环境包含了河流及其他提供给人们居住和生活的水文条件,以及包括了人们建造的堤围、码头、桥梁、水上交通线在内的综合因素。”作者提出的水环境的概念不仅包括了自然条件,还有自然水文条件影响下形成的人文要素。在这个思路下,作者不仅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上游开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加之下游围垦加快,造成珠江水网的不断变化,水环境的变迁影响到了城镇经济的发展,清前期形成的广州、佛山两个中心市场与航道变迁有关,而清中期佛山河道的堵塞,是其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还对影响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发展的河流水系等进行了研究,考察了水路交通网络对提升本地城镇的经济地位的重要作用。^⑥ 张华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山城市发展研究》中也关注到了近代中山(香山)城市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问题。^⑦ 相比较而言,探讨广州地区水文环境与城市发展的研究成果更多一些。邱丽《明清广州珠江河道的变迁与城市街巷空间的发展》一文指出明清时期珠江河道变迁主要体现在:珠江北岸南移,南岸相对稳定,珠江河道日益变窄。江岸的南移,城南沿江地带不断有新淤积的沙洲发育,为城市扩展提供了所需土地;明清时期珠江宽度的快速变窄,使它和城市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明代开始,珠江才真正成为广州城市建设的风向标,左右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规模,也就是从这时起,广州的街巷格局才逐渐被深深烙上珠江的痕迹,整体上呈现出带状城市、多中心组团式的街巷网络。^⑧ 关菲凡《广州城六脉渠研究》一文研究广州城六脉渠的历史变迁及城市史的相关问题,紧扣广州城内官方主导的水利建设历史,从六脉渠与古代广州城的相互关系、六脉渠的技术性、历代学者关于六脉渠的解释和

^① 徐俊鸣:《广州市区的水陆变迁初探》,《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1期。

^② 李俊敬:《珠江广州河段江岸的变迁》,《羊城今古》1990年第3期。

^③ 薛建强:《中山地区水文特性分析》,《水利科技与经济》,2010年第2期。

^④ 宋书丽:《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顺德部分成陆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⑤ 中山大学地理系:《珠江三角洲城市环境与城市发展》,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⑥ 吴建新:《明清珠江三角洲城镇的水环境》,《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⑦ 张华:《近代中山城市发展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⑧ 邱丽:《明清广州珠江河道的变迁与城市街巷空间的发展》,《华中建筑》2009年第1期。

重构等三大方面展开系统论述。通过研究发现,六脉渠不仅仅是满足排水的功能,还发挥着多种作用。^① 关于广州港的研究方面,邓端本的《广州港史(古代部分)》^②、程浩的《广州港史(近代部分)》^③,分别研究了古代和近代广州港的自然环境及港口本身的发展过程。吴家诗主编的《黄埔港史(古、近代部分)》,则是专门论述黄埔港发展史的著作。^④ 梁国昭《广州港:从石门到虎门——历史时期广州港口地理变化及其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一文研究了历史时期广州港口变化,认为从石门之南的兰湖古码头到今天虎门之南的南沙港码头,港口位置经历了一个大体由北而南、从西向东的迁移扩展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对城市的空间拓展产生引导作用,对城市形态发展产生重要影响。^⑤ 罗章仁《广州港过去和未来的区域地位》一文也考察了广州港的发展历史和广州港的港址变迁,并对未来港址布局进行了探讨。^⑥ 关于地貌对于广州城发展的重要作用,曾昭璇《从历史地貌学看广州城市发展问题》一文是这方面的发凡之作。^⑦ 关于湿地在城市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曾新《广州古城的湿地及其功能》一文利用历史时期地图与史志考证结合,探讨了2000年来广州古城湿地环境的变迁,以及湿地在广州城市生存与发展中的功用。^⑧ 曾新另一文《论湿地对古代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也研究了湿地对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认为湿地是广州古城扩展的主要空间,河涌引导了城市经济活动布局,湿地塑造了广州城市文化景观。^⑨

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同样也是促进城镇发展的重要因素。叶显恩《的商品流通清代广东水运与社会经济》一文就曾对水运与海外贸易的发达、商品经济的繁荣、市镇的兴盛、经济区域的形成等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⑩ 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一文则指出清代前期随着岭南区域经济开发的全面发展、手工业城镇与商业港市兴起、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水运体系的建立,产生出了一个完整的商品流通体系——岭南市场。^⑪ 叶显恩、许檀《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文回顾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明清时论述较为详细。^⑫ 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一文对珠江三角洲的墟市进行了研究,揭示出在

^① 关非凡:《广州城六脉渠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② 邓端本:《广州港史(古代部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

^③ 程浩:《广州港史(近代部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

^④ 吴家诗主编:《黄埔港史(古、近代部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6年。

^⑤ 梁国昭:《广州港:从石门到虎门——历史时期广州港口地理变化及其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热带地理》2008年第3期。

^⑥ 罗章仁:《广州港过去和未来的区域地位》,《羊城今古》2002年第1期。

^⑦ 曾昭璇:《从历史地貌学看广州城市发展问题》,《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⑧ 曾新:《广州古城的湿地及其功能》,《热带地理》2006年第1期。

^⑨ 曾新:《论湿地对古代广州城市发展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⑩ 叶显恩:《清代广东水运与社会经济》,见:白寿彝主编:《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

^⑪ 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市场的商品流通》,见:明清广东省社会经济研究会编:《十四世纪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⑫ 叶显恩、许檀:《珠江三角洲的开发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见:黄焕秋、许学强、陈镇雄等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回顾与前瞻》,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

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农村墟市的地位及其所起的作用，并从墟市的数量及规模考证了墟市的发展，对“墟”与“市”进行了区别；作者还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单位面积的购买力，亦即取决于人口密度和家庭依赖市场的程度，可用每平方公里的人数来衡量。^① 程明《清代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探讨》一文研究了清代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② 而刘志伟、陈春声《明清珠江三角洲传统市场的发展》一文则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深刻影响和制约着该市场发展的特质及其导向。^③ 李庆新《海外贸易与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变迁(1550—1640)》一文研究了明中后期海外贸易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④ 刘正刚《清代“泛珠三角”地区的粤商》一文则研究了广东商人在相关地区所建的会馆及其商业活动情况。^⑤ 司徒尚纪《穗港走廊地带的形成和演变梗概》一文指出明清时期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造就了穗港走廊地带的雏形。^⑥ 新近，吴宏岐发表了多篇涉及清代广州、香山、新会等与澳门水上交通方面的论文。^⑦ 陈嫦娥等对明清珠三角地区的燃料供应、燃料需求及柴炭市场等问题展开研究。^⑧ 张家玉等研究了晚清广州的防灾机制问题。^⑨ 吴宏岐、韩虎泰《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变迁考》细致研究了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变迁过程，对于了解明代肇庆和广州两城市政治地位的变化，当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⑩ 陈萍、邓婵娟则关注到了东莞古代盐业与古代城镇的兴起的关系，指出明清时期东莞盐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的墟市、交通的发展，在东莞城镇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⑪ 职晓东《地理环境与地方秩序的重建——基于对顺德建县的考察》认为珠江三角洲的成陆过程深刻影响了当地的土地耕种格局，从而影响了这里的社会关系。在地方与国家的博弈中，出现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明景泰年间的顺德开

^① 叶显恩、谭棣华：《明清珠江三角洲农业商业化与墟市的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② 程明：《清代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探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③ 刘志伟，陈春声：《明清珠江三角洲传统市场的发展》，见：黄焕秋，许学强，陈镇雄等编：《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回顾与前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④ 李庆新：《海外贸易与珠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变迁(1550—1640)》，见：叶显恩，谢鹏飞，林有能主编：《“泛珠三角”与南海贸易》，香港：香港出版社，2009年。

^⑤ 刘正刚：《清代“泛珠三角”地区的粤商》，见：叶显恩，谢鹏飞，林有能主编：《“泛珠三角”与南海贸易》，香港：香港出版社，2009年。

^⑥ 司徒尚纪：《穗港走廊地带的形成和演变梗概》，《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0年第4期。

^⑦ 吴宏岐：《清代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水道考》，《澳门历史研究》第6期，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2007年；《大黄滘地名考》，《岭南文史》2007年第4期；《释近代西方文献所记广州城西南的“澳门航道”》，见：《澳门文献整理研究暨数字化论集》上册，澳门近代文学学会，2008年；《〈中国丛报〉所见清代由广州经香山至澳门的内河水道》，林有能等主编：《香山文化与海洋文明第六次海洋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从新会到澳门：近代西江流域的水路交通》，见：林广志、吕志鹏主编：《“卢九家族与华人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民政总署文化康体部，2010年。

^⑧ 陈嫦娥：《明清珠江三角洲燃料问题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刘正刚，陈嫦娥：《明清珠江三角洲的燃料供求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

^⑨ 张家玉，刘正刚：《晚清火灾及防御机制探讨：以广州为例》，《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

^⑩ 吴宏岐，韩虎泰：《明代两广总督府址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3期。

^⑪ 陈萍，邓婵娟：《东莞古代盐业与古代城镇的兴起》，《盐业史研究》2010年第4期。

县筑城。^① 吴宏岐、李采梅的有关论文则研究了明代万历初年新安设县的时间、起因与建县过程。^② 靳道兴《明清澳门天主教堂建筑与澳门城市发展》一文认为澳门天主教堂建筑与澳门城市开埠及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它们不仅构筑了澳门城市建筑的主体风格,而且奠定了澳门城市规划的基本结构。今天的澳门,仍然保存着地中海城市特有的风采。^③

不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有关经济发展对城镇发展影响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集中于佛山研究方面。蒋祖缘《清代佛山商业繁荣的条件》一文将清代佛山商业繁荣归为政治、地理条件、经济、吸引外地人、海外贸易等原因,并认为诸多地理条件下航运条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指出由于明朝嘉靖以后,官窑涌的淤塞,佛山涌便成为连接西江、北江、东江的交通要道,使佛山镇有着很好的航运条件。^④ 谭棣华《明清时期佛山经济繁荣的原因》一文分析了明清时期佛山经济繁荣的原因,指出除社会环境、广州的贸易、劳动力充足以外,地理条件作为佛山经济兴起的客观条件,尤其是水上交通对佛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珠江三角洲商品农业的发展与粤北采矿业的进步也是佛山城镇繁荣的保证。^⑤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一书,细致地研究了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问题,指出明代佛山冶铁业兴起促进都市社会的兴起,清代商品经济的综合发展也使得佛山城镇达到繁荣。^⑥ 作者在其论文《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⑦ 王仁杰《明清时期佛山的商业地位》一文同样指出明代佛山依靠冶铁业发展成为四大名镇之一,清代则成为中心市场之一。^⑧ 司徒尚纪《澳门的历史性质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影响》一文从辩证的视角提出,澳门的历史性质和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对邻近的珠江三角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和深远的,在客观上,这种影响有积极和消极的,正面和反面的作用,不仅加速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促进生产分布的地域分异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更替,促进佛山等城镇的兴起和广州的繁荣,而且加剧地区和部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⑨ 作者的《佛山历史上兴衰及其原因初探》一文则从佛山城镇的兴与衰两个方面进行了总结,认为如果说佛山的兴盛是得利于地理、社会历史和经济等原因的话,鸦片战争以后,广东生产分布发生了质

^① 职晓东:《地理环境与地方秩序的重建——基于对顺德建县的考察》,《中国城市经济》2012年第2期。

^② 吴宏岐,李采梅:《明广东新安县立县时间考》,见:周长山、林强主编:《历史、环境与边疆——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李采梅:《明后期深圳地区设县之原因分析》,《中国市场》2010年第39期。

^③ 靳道兴:《明清澳门天主教堂建筑与澳门城市发展》,《兰台世界》2011年第13期。

^④ 蒋祖缘:《清代佛山商业繁荣的条件》,《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7期。

^⑤ 谭棣华:《明清时期佛山经济繁荣的原因》,《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⑥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⑦ 罗一星:《论明清时期佛山城市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⑧ 王仁杰:《明清时期佛山的商业地位》,《探求》2003年第3期。

^⑨ 司徒尚纪:《澳门的历史性质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的影响》,见:司徒尚纪:《岭南史地论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年。

的变化,佛山的衰落就是这个质变的缩影。^① 朴基水《清代佛山镇的城市发展和手工业、商业行会》一文也论述了人口增加所必然导致的城市结构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外观方面的变化,并通过史志的数据统计说明由于西方产品的流入等导致的行会盛衰及佛山工商业者社会地位的变化。^②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发展的历史人文地理基础,本身还应当包括明代以前相关城镇的发展情况在内。在明代以前广州城市史研究方面,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③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④已进行了不少开拓性的研究工作,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完善和补充。近年来,笔者先后发表了多篇论文,对前人的相关观点进行了商榷和修正。^⑤ 不过,对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他城镇而言,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

2. 市镇类型与城镇体系研究

在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市镇类型研究方面,以往较多关注墟市方面。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类型及其特点》一文认为明清时期广东的墟市,从商品交换的情况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没有固定字号商店的定期市场,称做“墟”;第二种设有固定字号商店的“常日为市”的常开市场,定期市场,称做“市”;第三种是“市与墟兼营之”的市场。尽管“这些农村小市场的特点是市场狭小,交换有限,与外界交往不多”,“由于地方封建宗法势力的禁锢和阻挠,明清时期广东越市时而兴盛,时而衰落,有的墟的规模自宋至清变化不大”,但是“一些建于交通要道上的新兴的越市,不同程度地冲破了封建宗法势力的阻挠,跨越了地域界线,和其他墟市联成一片,构成商品流通的网络,成为广东地方经济的动脉。”^⑥作者后来又撰写了《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盛衰、营运和租税的征收》一文,对自己以往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和补充,认为“在一些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地区,也曾出现过类似江南那样的手工业市镇,不过它们规模较小,不叫市镇,只叫墟或市罢了。”^⑦黄国信在《明清广东“镇”之考释》一文中,也依据广东的资料,认为明清时期广东地区以“镇”命名的聚落基本上仍以军事职能为主,担当

^① 司徒尚纪:《佛山历史上兴衰及其原因初探》,见:司徒尚纪:《岭南史地论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年。

^② 朴基水:《清代佛山镇的城市发展和手工业、商业行会》,见: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③ 曾昭璇:《广州历史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 陈代光:《广州城市发展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⑤ 参见吴宏岐,周玉红:《秦南海郡辖南海县说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4期;吴宏岐:《南越国都番禺城形态结构特征与形成原因》,见:左鹏军主编:《岭南学》第4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吴宏岐:《南越国都番禺城毁于战火考实》,《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吴宏岐:《广州城址二千多年不变说商榷》,《学术研究》2006年第5期;吴宏岐:《汉番禺县城故址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吴宏岐:《唐番禺县治所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吴宏岐:《宋代番禺县治所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1期;吴宏岐等:《南汉国都兴王府城形态特征初探》,《中国古都研究》2013年第2期等。

^⑥ 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类型及其特点》,《学术研究》1982年第6期。又载李龙潜:《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⑦ 李龙潜:《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盛衰、营运和租税的征收》,见:李龙潜:《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起江南市镇职能的聚落是“墟”。^① 汤苑芳新近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分合与互动：清代广东墟市地理(1644—1911)》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清代广东墟市名称多样，主要有墟、市、栏、行、埠、务、港、营、街市、圩、街、镇、铺市等，还有墟市并称、墟市名称互换等现象；有清一代，广东有三个地区的墟市经济长盛不衰，分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西海岸及琼州府北部地区、南肇庆地区；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下，清代广东的墟市的类型多样，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类型，即民间墟市与官方墟市、综合墟市与专业墟市、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平地墟市与山区墟市、沿海墟市与内陆墟市、大陆墟市与岛屿墟市、热带墟市与亚热带墟市、经济型墟市与政治型墟市等。^② 另外，李华《明代广东墟市研究》、^③ 胡波《岭南墟市文化论纲》^④ 等文对明清时期广东墟市的相关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许桂灵《岭南历史名镇源流、类型及其开发利用》一文对岭南历史名镇进行研究，将岭南历史名镇按其功能大致可分为交通、产业、市场、名人、艺术文化等类型，也有一定参考价值。^⑤ 以上论文都是以广东或岭南地区为研究范围的，只是有部分内容涉及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杨承舜《清代珠江三角洲市镇管理研究》一文可以说是清代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墟市的专题成果，但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墟市管理方面，同时对明代的具体情况研究不足。^⑥ 另外，张敏学《虎门城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从管理机制入手探讨了虎门的城镇管理问题，但研究重点偏重于现当代。^⑦ 值得注意的，珠江三角洲区内部是存在差异性的，与珠江三角洲南部地区的圩市相比，珠三角北部山区的圩市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吴宏岐、赵国栋《明清广东增城县圩市发展的初步研究》一文以增城为例进行初步探讨。^⑧ 更多细致的研究，尚有待进一步展开。

在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体系研究方面，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一文提出清代岭南区域内出现了广州、佛山两大中心市场并存的局面，并从商品结构、商人组织和市场网络进行论述，认为广州是“洋货”和“土特产”的集散中心，佛山是“广货”和“北货”的集散中心，由此形成了两个功能不同的中心市场；市场网络上，广州与佛山各自有自己的市场网络，广州与佛山两大中心市场之间的贸易联系是相当紧密的。^⑨ 作者的《试论清代前期岭南市场中心地的分布特点》一文研究得出清代前期珠江三角洲的市场中心地是同心圆结构，市场中心地以广州、佛山为圆心，递次分布，离圆心越近，分布越密；离圆心越远，分布越疏。^⑩ 他还在其《论广佛周期与岭南的

^① 黄国信：《明清广东“镇”之考释》，《中山大学史学集刊》第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汤苑芳：《分合与互动：清代广东墟市地理(1644—1911)》，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③ 李华：《明代广东墟市研究》，《平准学刊》第四辑下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④ 胡波：《岭南墟市文化论纲》，《学术研究》1998年第1期。

^⑤ 许桂灵：《岭南历史名镇源流、类型及其开发利用》，《热带地理》2008年第1期。

^⑥ 杨承舜：《清代珠江三角洲市镇管理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⑦ 张敏学：《虎门城镇管理体制创新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⑧ 吴宏岐、赵国栋：《明清广东增城县圩市发展的初步研究》，《兰台世界》2011年第19期。

^⑨ 罗一星：《清代前期岭南二元中心市场说》，《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⑩ 罗一星：《试论清代前期岭南市场中心地的分布特点》，《广州研究》1988年第9期。

城市化》一文中提出“广佛周期”这个新概念,用来指明清时期以广州和佛山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和衰落的周期。该论文指出在岭南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广州周期——广佛周期——广州周期的经济发展阶段,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1600 年为广州周期,1600 年至 1900 年为广佛周期,1900 年后新广州周期的再兴,其中广佛周期是城市体系形成的黄金时代,对岭南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其指标有三个,一是区域内各级城市间经济联系的一体化,二是城市化指数的提高,三是城市层级体系的形成。^① 卜奇文《论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市场中心地分布的差异性》也研究了明清时期岭南东部市场中心地分布的特点,认为明清时期由于岭东商品经济辐射源的形成,因此它的市场中心地的分布相对岭西的市场中心地的分布更为复杂。岭南东部的市场中心地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以广州和佛山为圆心的珠江三角洲圆形分布;另一个是北江、东江中游和韩江、梅江流域地区树状型分布,两种层次不同的市场中心地同属于自发型,不过相对而言,珠江三角洲地区墟市和城镇比较密集。^② 黄滨《明清珠三角“广州—澳门—佛山”城市集群的形成》一文指出,明清时期在中国封建小商品经济高涨的推动下,广州城市经济辐射能力陡然剧增,其经济行业运行地理空间的向外延伸,直接催生了附近地带崛起澳门、佛山两座城市,使得珠江三角洲出现了自身历史上第一个城市集群——“广州—佛山—澳门”;珠三角城市集群的具体分工组合是:广州本城为母体和轴心,澳门为外港,佛山为内港,实际上是一个“大广州”城市集群。在明清时期,这一城市集群贯通内外,互为倚角,一体运转,不仅成为珠三角、甚至广东全省经济中心城市,而且构成全国当时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③ 司徒尚纪《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网络的嬗变》一文则系统研究了秦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网络的嬗变的过程和规律,认为明清(鸦片战争前)广州、澳门双中心并峙并形成 T 形经济地理网络,但鸦片战争后由于港澳易位而使 T 形经济地理网络有了新发展。^④ 李红卫、王建军等在《珠江三角洲城镇空间历史演变与趋势》一文中简述了珠江三角洲城镇空间结构的变化,认为自珠三角有人类聚落出现以来到明朝的长时间内为单中心,明清解除海禁后出现广州、澳门的双中心结构,鸦片战争后则变为广州、香港双中心结构,1990 年后则出现网络化格局,并将新的动力来源于政府主导的集约型基础设施投资作为珠江三角洲向新的格局变化的动因。^⑤

3. 城镇形态与城镇空间结构研究

近年来,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形态与城镇空间结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的广州城方面。曾昭璇的《广州历史地

^① 罗一星:《论广佛周期与岭南的城市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② 卜奇文:《论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市场中心地分布的差异性》,《广东史志》2001 年第 2 期。

^③ 黄滨:《明清珠三角“广州—澳门—佛山”城市集群的形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

^④ 司徒尚纪:《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网络的嬗变》,见:郑天祥等:《以穗港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地理网络》,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1 年。又见:司徒尚纪:《岭南史地论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4 年。

^⑤ 李红卫、王建军:《珠江三角洲城镇空间历史演变与趋势》,《城市规划学刊》2006 年第 4 期。